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当代中国思想家文库

Contemporary Chinese
Thinkers' Series

王元化文稿

中 / 文化卷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当代中国思想家文库

Contemporary Chinese
Thinkers' Series

王元化文稿

中 / 文化卷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当代中国思想家文库编辑委员会

总 策 划：葛海彦

主 编：俞可平

执行主编：邢艳琦、贾宇琰

编 委：范世涛、刘英、邓彤、王青、张馨文

目 录

第一辑 人文精神与千禧年主义

道德及其现代价值	003
生命、人文和政治文明	010
关于《中国与当今千禧年主义》的几句话	015
关于文明的物质化、庸俗化与异化的通信	029
《陈方正论文自选集》序	035
人文精神与二十一世纪的对话	038
答剑桥国际传记中心问	044
致 书 书	046

001

目
录

第二辑 与雅克·德里达对话

与德里达对话访谈录	051
玛雅访古志	059
“达巷党人”与海外评注	064
与友人谈海内外学风书	070

姜椿芳与大百科全书	074
关于斯城之会及其他答问	077
谈 想 象	
——致海外友人书	084
悼目加田诚	089
在南京大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致词	091
《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译序	093
参观斯特林堡纪念馆后想到的	099

第三辑 马克思与王国维

人性札记	105
马克思主义面临的两个挑战	112
思想政治工作的改革	115
谈几个理论问题	121
为周扬起草文章始末	126
记 冯 定	132
记 若 水	136
我所认识的冯雪峰	141
王国维读《资本论》	145
王国维的境界说与龚自珍的出入说	146
《王国维全集》序	151

第四辑 “五四”精神与东西文化

论传统与反传统	
——为“五四”精神一辩	155
与友人书：谈古史辨	174

杜亚泉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	178
关于近年的反思答问	202
对“五四”的思考	214
胡适与京剧偶记	217
郭嵩焘与湖南新政	220

第五辑 读黑格尔与卢梭

读黑格尔的思想历程	225
论知性的分析方法	236
黑格尔哲学批判	244
卢梭公意说与黑格尔三范畴论	246
张奚若谈卢梭	248
与友人谈卢梭社约论书	252
附：吴江来信	269

第六辑 理想主义的曲折历程

《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序	275
记 顾 准	278
谈孙冶方	281
记张中晓	290
我和胡风二三事	299
七律一首	303
记 满 涛	304
记林淡秋	307
附：唐康来信	313
悼念慎之同志	316

《适夷十封信》跋	318
谈鲁迅思想的曲折历程	320
纪念与超越	322

第七辑 有关上海文化发展的意见

有关上海文化发展的意见	327
附：有关发展上海文化事业建议书	331
文化发展战略是项系统工程	334
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的制定	340
文化交流和古籍整理	347
《文化发展八议》后记	354
《新启蒙》编后	359
关于文化问题答《海上文坛》记者问	366
《学术集林》编后记	369
邂逅草书话	381

第八辑 学者与思想

记熊十力	393
再记熊十力	398
记韦卓民	405
记郑桐荪	409
记林毓生	411
谈汤用彤	414
谈杨遇夫	417
读樊著龚自珍考	422
谈胡适小集	428

谈胡适自传唐注	433
悼 冯 契	440
记谭其骧	442
贺麟《文化与人生》	444
陈澧《东塾读书记》	447

第九辑 “走自己的路”

自 述	451
重返清华园	457
寻根江陵	463
走自己的路	474
“以我为例”	475
我的三次反思	479
《清园近作集》序	487

清教徒家庭的價值

第一輯 人文精神与千禧年主义

道德及其现代价值^①

问：今天我们的这个有关道德建设的话题，是否可以先从“五四”谈起？

答：“五四”新文化赋予了我们文化传统以许多崭新的因素，最主要的就是独立的思想和自由的精神。“五四”时代对于那些旧道德，譬如守旧的不近人情的妇道、孝道等，是持激烈的反对意见的。这在“五四”新文化代表人士的作品中俯拾皆是。但是由于矫枉过正，当时人在反传统伦理方面有时未免做得过火，甚至凡旧道德、旧伦理、旧观念皆被全盘否定，有些属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可以向现代化转化的东西也一并被唾弃。那个时期，除个别学者，几乎所有的文化先驱者，都是传统道德的激进反对者。

但是正如柳诒徵在一九二四年所撰之《中国文化西被之商榷》中言，“西方立国在宗教，东方立国在人伦”。中国社会现在所存在的宗教多非源自本土。中国是一个以无神论为主导的国家，但很注重伦理。黑格尔曾说过孔子的《论语》其实就是一部道德箴言。中国传统道德一方面受到“五四”先驱者的猛烈抨击，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得不承认，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伦理道德上。如

^①（原注）本文为作者答《上海党史与党建》记者唐旻红关于传统道德及其现代价值的提问。

果将伦理道德全盘去掉，中国还有没有立国的根基？西方的外来价值学说能不能很快在中国的社会土壤中生根？这个复杂的问题他们考虑得比较简单。

因此，“五四”时期对于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批判是在急于求成的心态下，在你死我活的思维模式下，在“新的就是好的”这样庸俗进化观的价值取向，把批判简单化了。比如在“五四”文化激励下的年轻人热衷于走出家庭这样的反叛行为，对于中国传统家庭中讲究父慈子孝、双向调节的人伦关系，是一种粗糙的破坏。传统家庭伦理中当然有压抑性的关系，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中国家庭伦理的主要精神是主张和谐、互为对方着想。而这种建立在和谐意识上的人伦关系，这种旧道德中的合理因素，其实应该是可以作为可贵的资源，并将其向现代化方向转化的。而在西方的道德传统中，却缺乏这样的资源。它尊重人权，崇尚独立人格，但有原子式的极端个人主义倾向，家庭关系较为淡漠。这是它的一种缺陷。在西方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这个问题了。

当然，道德的历史和文化的历史都是不可能重新设计的。我们并没有理由去责怪先辈应该做什么或不应该做什么。近代的中国，一股股强大的来自外部的力量威胁着我们国家、民族、家庭和人身的安全。国破家亡的境况，加上知识分子对社会文明天然的关怀和忧患，促使当时有良知、有责任心的中国人都趋于极端化。再加上鸦片战争后百余年间，从洋务运动、康梁维新，到辛亥革命，每次改革都以失败告终。于是很容易使人认为屡屡失败的原因就在于革命的不够彻底。在这样的气候下，“五四”时期喊出了一些矫枉过正的、过激的口号，而如当时《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这样主张温和渐进改革、主张东西文化调和、主张开明与保守兼备的“接续主义”的学者，却被作为反对革新的落伍者，因而在东西文化问题论战中被激烈抨击。可以说，自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以后相当长一段时期的中国，有一种左的倾向。只不过，由于外患、内战等时代因素，这

种左的倾向后面的病症被遮盖住了，没有充分冷静地被人们所认识和了解，而且，这种要求彻底的流弊影响深远，一直延续到数十年后的政治批判运动中，竟至达到了极端酷烈的程度。今天我们所能做的，当然不是去指点当年应该如何如何，而是理智、清醒地反思它，冷静从容地从学理上分析时代背后的思维模式、深层病因，并认真考虑今天该怎样对待传统道德，怎样倡导传统道德，怎样一方面提炼传统道德中的基本精神或理念，另一方面提高警惕，认真区辨，不要为历代那些社会、政治、经济附加其上的时代烙印和落后元素所迷惑。

问：您刚才谈到了杜亚泉所主张的“接续主义”。那么我们现在该如何对传统伦理道德进行接续呢？

答：杜亚泉对待历史文化的接续主义思想也可以用在伦理道德上。我们今天已充分认识到，中国的传统文化包含了极为丰富的内容，自然我们的传统文化不能用伦理道德来简单概括。但伦理道德的精神和原则渗透到传统的各个方面。如果从中抽掉这些精神和原则，传统也就所剩不多了。我们在认识到传统伦理道德在旧社会中所表现的呆板僵硬和它带给人们的黑暗冤抑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像“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恻隐之心”“谦逊仁爱”“勤学敬业”等等，都或体现了传统思想有关人的道德主体的和谐精神，或体现了儒家思想本身所具有的人文精神内涵。这些传统伦理道德中的基本精神或根本理念，使得中国人在面临危难时能更多地考虑群体而非个人的利益，使得中国的知识分子有更强烈的忧患意识，使得社会里毕竟多少有了一些公理的空间、公共的诉求，有了表达社会舆论的某种可能性。最后，也使得中国社会主流价值比较注重精神价值，追求着将人提高、向上的生活。当然其中还有一个向现代化转化的问题。

问：建国后我们党内也考虑过道德继承的问题吗？

答：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曾展开一次道德继承问题的讨论，但讨论没有结果，便不了了之了。因为当时由于对阶级机械分析的教条主义作祟，无论是哪一方都认为传统道德打上了封建烙印，是统治阶级的货色，所以当时大多数人认为传统道德是不可继承的。只有个别人认为可以，如冯友兰提出了“抽象继承法”。那时社会上阶级斗争是一种普遍的思维模式。两军对垒式的思想年代，哪里有什么学理？改革开放后，有些人认为改革开放时期提出伦理道德问题就是干扰体制改革，就是道德理想主义。这种看法过于偏颇了。这些人，以为只要经济上去了，什么都会一了百了。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伦理道德是人文精神中的重要部分，也是社会良性发展必不可少的保证之一。

问：今天我们在谈以德治国，在谈道德重建，恐怕正是基于您刚才所提到的，无论是中国的传统道德还是西方的外在超越模式，都已不可能为今天的中国所直接取用，都有一个或转化或融合的过程。那么，中国当代的知识分子和执政者有望在其中起些什么作用，承担哪方面的职责？

答：首先，道德不是人们所从事的某种职业，因而道德体系的建立和巩固，也不是由社会上的哪一类人专门去担当的。但知识分子，尤其是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知识分子，是可以在其中做些事情的。

就具体内容而言，我认为传统道德中的“小传统”问题更应该值得人文知识分子们加以关注。而恰恰这方面的研究却尤为贫弱，甚至可以说几乎没有。何谓小传统？深入传统道德的思想结构，你会发现，它有大传统与小传统之分。大传统就是一代代知识分子传承下来的经史、诸子思想，上层文化等，小传统则是戏曲、小说、民间传说等民间文化形式流传下来的、乡俗化了的道德文化观念。大传统经由民间的筛选、改编、再创造，变成了小传统。虽然它有

时会将儒释道混在一起，会将大传统中一些经典的东西曲解、歧解，但它却能广泛而深刻地直接影响国人的大多数。我小时候在乡间往往可以看到作为纲常名教象征的贞节牌坊。许多穷乡僻壤的妇女拥有强烈的节烈观念，但她们连字都不识，也就不可能从大传统中获取这些观念。可见小传统作为传统中影响民间社会的主导力量，是不容讳言的。我们的思想界、学术界应该对这个问题好好研究一下。这是一项非常复杂而艰巨的工作，同时又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搞好了，对今天一定会有不少启示的。

过去我们一直比较注重自然科学的研究工作，而对社会科学进步的意义认识不深。由此造成在中国知识分子身上人文精神的逐渐衰弱。社会科学的进步对于一个国家、民族的发展来说，其作用是不可替代的。一九七九年后较为宽容的理论环境促使我国的政治经济的理论建设有了较为长足的发展，相信对道德伦理方面的作用也将会是一样的。

问：通过对传统进行发掘、探索和转化后，还有一个使之与现实生活结合的问题。对此您如何看？

答：中国目前改革重点首在体制与法治建设，这是不错的。中国传统伦理观念也确实属于一种内在的超越，是与西方重法律的外在超越式文化分属两种不同文化模式的。今天要想依法治国，任务是非常艰巨的。情况十分复杂，但不能因为困难和复杂就不去做，就简单化地回避道德问题。我们所说的“任务艰巨”，是指法治和德育是有联系的。简言之，法律应有普遍的价值原则。在这方面，现代法学家和政治哲学家已经有充分的讨论，比如人权、公平、正义、民主等所形成的价值原则都含有道德观的因素。这些价值原则在中国成为法治的社会文化基础还有艰苦长期的工作要去完成。而我们所说的“情况复杂”，是指法治与道德又应区分，并非所有的不良行为，用道德规范去教化就能有效用的，也并非一切道德问题，都要归入法治的范围去解决。这两方面我们都面临着转型时期复杂多变

的情形，必须一边发展一边建设。

另一个问题是，也有一些人没有经过深入研究就滥取滥用传统资源。还是以法为例。我们有法家，有历朝历代的律法，直至大清律，但并不能由此说明我国具有悠久的法治传统。法治理论与法治经验在中国的传统资源中甚为稀薄，大多只是作为统治手段的法制，在诸子观点中，也看不到法律主治的意义。虽然孟子的法与法家的法不尽相同，却也没有超出法制观念的范围，不能成为今天进行法治建设的传统资源。同时，在我们的现代化生活中诸如个性、人权等等必不可少的现代理念，也是从传统中很难寻觅的。情况复杂的另一例子是：一方面作为家庭伦理、私德领域、公德中的礼让等，是现代社会不可废弃的。但是另一方面，作为人格健康的成长理论，中国传统道德中抑制个性的理念使得人难以充分挥发才智、振作精神。这与现代社会对于人的要求是相抵触的，对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方向更是一种阻碍。由此可见，对传统资源作出理性的区分，对于传统和现代价值不至于“合之则两伤”，是非常必要的。

问：您刚才也提到了西方重法律、人权、个性等观念。是否能就对待西方伦理观念这一问题更深入地谈谈？

答：就整个世界范围来看，恐怕这一个世纪的主流，仍然是科技文明的功利主导。人们的大多数活动和形形色色的个性，正在逐渐被科技和利润之手整合为一体。科技和利润的逻辑正在逐渐成为评估一切发展进步与落后的准绳。如果是这样的话，离马克思所说的人的解放、人的全面发展、个性的充分发展，确是还有相当远的路要走的。西方关于人的自由发展的思想，一个新课题是如何回应消费主义（consuming）。从美国发端的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已成为二十世纪影响力巨大的潮流，如今正在向世界各地蔓延。我们国家正在一步步融入整个世界，而科技与经济的进步推动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同时也推动着关于赚钱、花钱的消费主义的兴起。这一切必然带来各种伦理后果。譬如，功利主导的价值观势必会在我们的

文化中占领地盘。美国宾州大学历史学教授卡罗斯（Gary Cross）的最近一本新书《全面消费的世纪：商业主义在美国胜利的成因》，就专门研究这个问题。一向对中国怀有感情并将自己的精力用于中国问题研究的史华慈（Benjamin I. Schwartz）教授，在他的遗笔《中国与当今千禧年主义》中就曾说，中国今天实在没有理由为西方以消费主义、物质主义为涵义的普世理念蔓延感到兴奋（大意）。可见，西方一些敏感的人文知识分子已经意识到了伦理方面的世界性危机。在这样一个世纪转换交替的时刻，期望看到更多中国的知识分子对此加以关心和忧虑，更多一些批判精神。

二〇〇三年五月

（《清园近作集》，文汇出版社2004年8月）^①

^① 亦载《王元化集》卷六，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10月。